

身份、主体性与未竟的抗争：《来世》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分析

兰超强

中国矿业大学，中国·江苏 徐州 221000

摘要：本文以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小说《来世》为研究对象，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角度，聚焦于殖民与父权交叉压迫下的非洲女性生存困境，通过文中角色阿莎、阿菲娅这两位殖民地女性角色，从身份塑造、主体意识与抗争结局三个维度展开分析。经过分析，在身份层面，阿莎的婚姻商品化可表现出女性身体沦为殖民经济与父权家庭的交易工具，而阿菲娅通过知识获取与命名权争夺，重构了被殖民者抹杀的文化记忆；在主体性层面，女性以隐性抵抗（如家族尊严维护）和显性反叛（如自主婚姻）挑战压迫结构，女性自主权与智慧的展示，也反击了殖民话语中对殖民地人群愚昧被动，需要被文明引导的刻板印象。但与此同时，其经济依附性暴露了后殖民社会中女性独立的局限性；在抗争结局层面，阿莎的死亡隐喻了结构性暴力的不可撼动性，而阿菲娅的“成功”表象下暗含殖民创伤的代际传递，揭示女性抗争在交叉性压迫中的复杂性。本文通过后殖民女性视角重读《来世》，既补足了学界对古尔纳作品中女性叙事的忽视，亦批判性反思了后殖民语境下殖民地解放的深层困境。

关键词：《来世》；后殖民女性主义；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交叉性压迫

Identity, Subjectivity, and Unfinished Struggles: Analysis of *Afterlives* from a Postcolonial Feminist Perspective

Lan Chaoqia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China Jiangsu Xuzhou 221000

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a postcolonial feminist lens to examine Abdulrazak Gurnah's novel *Afterlives*, and it focuses on the survival problems of African women under the dual oppression of colonialism and patriarchy. Through these two colonized female characters—Asha and Afiya, we can see the analysis unfolds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identity formation, subjective agency, and resistance outcomes. In identity-wise, Asha's commodified marriage shows the female body as a transactional tool between colonial economics and patriarchal structures. On the other hand, Afiya reclaims erased cultural memory through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the act of naming. Women challenge oppression via covert resistance (e.g., preserving familial dignity) and overt rebellion (e.g., autonomous marriage), and it subverts colonial stereotypes of "passive ignorance." But in the same time, their economic dependency expos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ir independence in such societies. As for resistance outcomes, Asha's death shows the intractability of structural violence, and Afiya's "success" masks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olonial trauma, so it shows the complexity of resistance within intersectional oppression. By paying attention to gender in *Afterlives*, this research addresses the neglect of female narratives in Gurnah's work and critiques the unresolved contradictions in postcolonial liberation. Also, It argues that individual resistance remains insufficient without dismantling the institutionalized collusion of colonialism and patriarchy.

Keywords: *Afterlives*; Postcolonial feminism; Abdulrazak Gurnah; Intersectional oppression

0 引言

作为 2021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以其对后殖民语境下离散经验、文化创伤与身份重构的深刻书写，成为当代世界文学的重要坐标。他的作品始终聚焦于殖民历史遗留下的复杂社会，通过个体命运的细

微描摹，揭示权力结构对边缘群体的深层规训。^[1] 古尔纳经常在小说中设置一系列结构性的对立，比如有非洲与欧洲、野蛮与文明、优越与自卑、中心与边缘、强势与弱势等之类，从而形成叙事进程和人物身份的内在张力。^[2] 这些对立不仅构成叙事张力，更折射出殖民权力结构对身份

认同的规训。不难发现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古尔纳小说通过对战争和殖民带给普通人创伤的反思,来思考身份认同和精神归属问题^[3]。然而,现有研究虽对其殖民话语分析确实已经很多了,大家却普遍忽视了这些结构性对立性别维度上的特殊显影,即当殖民主义与传统性别观念在非洲大陆形成共同作用时,女性或比男性承受到额外其他方面的结构性压力。不仅如此,这些所承受的压力并非两种压迫的简单线性单线程叠加,而是一种相互渗透、彼此强化的交叉性升维暴力,这正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着力破解的核心命题。所以说,文学理论就像眼镜,我们对同一部作品在使用不同文学理论分析时,可以自然而然发现曾经错过的细枝末节。同样的,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来审视的话,不难发现在古尔纳的创作谱系中,小说《来世》^[4]以其对殖民地女性生存境遇的细腻呈现,为我们理解殖民与父权双重压迫下的性别政治提供了独特的文本视角。

在古尔纳的《来世》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双重压迫具象化为阿莎与阿菲娅的生存困境,前者阿莎的婚姻被纳入殖民经济体系,身体成为父权家庭与殖民贸易的交换工具,后者阿菲娅试图通过掌握西方知识突破认知边界,却在殖民教育构建的“文明或蒙昧”叙事中陷入文化身份的撕裂。由此可见,她们的遭遇暴露出,当殖民权力以“现代化”之名重构社会秩序时,父权制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借由殖民制度获得了新的合法性,形成对女性的双重压力。因此,本文正是想要以后殖民女性主义这一理论为切口视角出发来论述。目的通过《来世》中阿莎、阿菲娅的生命轨迹,从二者身份塑造、主体意识、抗争与结局这三个角度,分析殖民与父权交织下的女性生存逻辑,既能发现结构性对立性别层面的深层运作,也为古尔纳研究补上被长期忽视的女性主义维度。这些非洲女性作为性别地位的他者,和被殖民地作为殖民世界的他者形成同构地位,成为殖民暴力结构的微观复刻。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殖民女性主义则通过交叉性视角揭露这种双重压迫的共谋关系,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解读古尔纳笔下女性命运不可替代的工具。

1 身份塑造:殖民与性别的双重规训

1.1 阿莎的身份塑造

让我们首先从债务的殖民性来看,阿穆尔·比亚沙拉将阿莎嫁给哈利法的决定,表面是家族内部的婚姻安排,实则隐藏殖民经济的深层侵蚀。当德国殖民者摧毁了本土传统的经济后,非洲家庭的财产安全性被彻底动摇,原本作为安身之所的房屋,成为需要通过婚姻关系来保全的脆

弱资产。同样还有阿莎的父亲。他看似在“保护”女儿,实则是在殖民经济制造的生存焦虑中,被迫将女性身体视为最后的可置换资源。可是这种交易逻辑的问题是,殖民势力通过经济剥削让非洲家庭丧失了正常的生产生活能力,却又让父权制度来承担“教化者”的角色,这就从而在性别的微观层面复刻形成一种“隐性的殖民暴力传递”。^[5]简单来说即阿莎父亲所欠债务源于德国殖民者垄断的产业,殖民经济摧毁本土自足性,看似与非洲女性无关,实则迫使非洲家庭将女性身体作为仅存的可交易资产。

接下来再看父权的合谋机制。“保护她免受不光彩的私通”“保护家族清白的名声”这些理由,实质是将殖民话语中的“文明使命”内在化。而这一逻辑正如殖民者声称要“教化野蛮的非洲人”是一模一样的,哈利法以“庇护者”姿态出现,将阿莎视为需要被规训的对象,不难发现,这种性别权力关系可以看作是“白人的负担”在家庭层面的微缩版。^[6]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文本中强调哈利法“依赖”阿穆尔,这种依赖关系其实是暗示着父权体系内部的等级制的。那就是阿穆尔作为有产者,选择将女儿嫁给依附于自己的哈利法,既巩固了自身在家族和殖民经济中的地位,又强化了父权制下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支配权。

1.2 阿菲娅的身份塑造

在阿菲娅给孩子取名字时,我们便可一观古尔纳对阿菲娅这一女性角色的塑造情况。阿菲娅在生下孩子之前就已经决定“如果是男孩,就叫伊利亚斯;如果是女孩,就叫鲁基娅”。当殖民者推行语言同化政策,试图将非洲人的命名体系纳入基督教或殖民文化框架时,阿菲娅坚持用本土名字,本质上是对文化命名权的无声收复,因为这些名字承载着家族谱系的记忆,延续着未被殖民话语污染的传统。我们可以意识到,尽管殖民者试图制造文化断裂感,让非洲民众与自己的文化传统割裂,但阿菲娅通过命名这种方式,以文化遗产的连续性有力地回应了殖民者的文化压迫,让非洲文化的生命力得以在艰难的环境中延续下去,成为抵抗殖民文化霸权、维护文化多样性和独立性的重要象征。

不仅如此,阿菲娅也是一直在学习文化知识的。殖民者为强化对殖民地区的控制,刻意塑造被殖民地等待解放的形象,尤其是塑造出非洲女性“被动无知”的刻板印象,将她们视为文化意义上的客体,以合理化其殖民统治。这种刻板印象的塑造蕴含着深刻的权力话语运作逻辑。知识的获取往往被殖民者所垄断和控制,他们试图通过限制非洲女性的教育机会来维持其文化统治。而阿菲娅克服重重

困难,努力学习识字,这表明她拒绝接受殖民者所赋予的“被动无知”的身份定位,积极追求自我觉醒和提升。

2 主体意识:抵抗的能动性与局限性

2.1 阿莎的主体意识

我们从阿莎在家庭中的具体实践切入,能清晰看到殖民语境下非洲女性在有限空间内的生存智慧与结构性困境的复杂交织。比如,哈里发因殖民债务而掉进困境时,她主动承担管理内务、协调资源分配的责任,甚至参与债务谈判。她不仅提出缩减开支的具体方案,更使这些建议被家族采纳。这表明阿莎在有限范围内争取到实质话语权。她的行动并不是简单的被动顺从,而是在传统框架内寻找缝隙的主动抗争。然而,我们还是可以意识到阿莎的经济独立性始终被系统性禁锢。在父亲所欠债务清偿后,她仍被迫只能留在夫家。这一困境的根源并非情感依赖,而是殖民与父权共同作用的制度性情境。一方面,德国殖民者剥夺女性继承权,切断她回归原生家庭获取土地的途径。而在另一方面呢,父权家族视离婚女性为“外人”,娘家拒绝提供庇护。这种结构性压迫导致其劳动价值遭受双重剥夺。更何况家族内务,甚至需乞讨零用钱购买个人必需品。阿莎的抵抗就陷入了残酷悖论,那就是她的每一次抗争都在无形中加固压迫系统。因为当她越努力承担家族责任,那么她越成为证明哈里发家族“仁慈统治”的工具。同样的,越竭力维持家族体面,越掩盖殖民经济对本土家族的摧毁。不难看出,这表示了后殖民女性主义的深层困境,也就是说在制度性暴力未被根除前,个体抵抗其实最终将沦为系统维持运转的燃料。

2.2 阿菲娅的主体意识

与阿莎相同的是,阿菲娅的生活中也充满了交织的结构性压迫。不过,与阿莎不同的是,阿菲娅的婚姻选择构成对殖民与父权双重压迫的实质性挑战。正如前文分析所言,包办婚姻作为父权制度的核心手段,这其中的运作逻辑与殖民者的“文明引导”是同一个道理的,因为二者均以“为弱者代言”之名剥夺主体选择权。在家族试图通过包办婚姻将阿菲娅许配给富商时,实则这背后是将父权控制包装成“女性庇护”,这与殖民者以“文明教化”包装剥削的本质如出一辙。但小说中的阿菲娅勇敢拒绝了这一安排,选择与伤残退伍士兵哈姆扎结合。可以说,这一行为确实不可谓不充满了反抗意义,反倒强有力地证明了非洲女性具备独立判断能力。其次,她对包办的反击直指本质,将殖民者与父权制标榜的负担彻底祛魅为掠夺。最后,二人婚姻的温馨生活构成最有力的反击。因此,当个体突

破殖民与父权的双重交织,以经济独立与文化自信为武器,便能在压迫结构中开辟解放空间。

3 抗争与结局:交叉性压迫的代际循环

3.1 阿莎的悲剧性死亡

在古尔纳的小说《来世》中,阿莎的悲剧性死亡深刻揭示了后殖民女性主义面临的一个核心困境,那就是个体情感上的抵抗难以撼动根深蒂固于社会结构中的制度性暴力。而这一困境凸显了后殖民女性在追求解放过程中所遭遇的复杂挑战和限制。殖民主义和父权制在非洲社会中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压迫网络。我们通过分析不难发现,殖民主义带来了经济剥削、文化霸权和政治控制,破坏了非洲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同时也强化了性别不平等。与此同时,父权制则在家庭、社区和社会各个层面限制了女性的权利和地位,使她们在多领域领域处于从属地位。阿莎所面临的压迫正是这种双重压迫的体现,她的悲剧性死亡反映了这两种力量交织下对女性个体生命的伤害。通过分析我们能意识到阿莎的遭遇正是这种交叉性压迫的典型案列。她的性别使她在家庭和社会中受到父权制的束缚,而殖民主义的影响又进一步加剧了她的困境。即使阿莎在家族内部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经济参与度,她在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仍然无法摆脱被压迫的地位。可以看到,阿莎没有死于殖民者的皮鞭或枪口,却死于制度精心设计的“系统性忽视”。之所以这么说,正是因为这两种制度就分别指殖民经济让药品成为奢侈品,父权观念让女性健康的重要程度变低,钝化了对女性生命价值的基本感知能力。

3.2 阿菲娅的不完美结局

那么我们再反观阿菲娅呢?阿菲娅的收入需补贴家用,甚至负担哈姆扎的疗伤费用。这种家庭化生存经济,其实我们也不难发现是殖民社会强加给女性的代偿性责任。我们可以看到当殖民战争摧毁男性养家能力后,女性被迫以低偿劳动维系家庭存续,成为殖民暴力的缓冲垫。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作者说尽管阿莎确实做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并且在婚姻上做出了自我选择,但殖民与性别上带来的困扰仍然影响着她。其丈夫哈姆扎的伤残身体、哥哥大伊利亚斯和儿子小伊利亚斯的异常行为,是身体政治上的殖民暴力代际传递。阿菲娅为儿子命名伊利亚斯,目的是抵抗殖民文化霸权、维护文化多样和独立。但古尔纳让小伊利亚斯经常被舅舅“招魂”,很显然这不仅影响了个体的身体和心理,也破坏了家庭的稳定和谐。总总以上,即使女性没有上战场而是回归家庭,一样会受到殖民者的

侵蚀。相较于阿莎,可能说阿菲娅的结局虽略显乐观,但其抗争成果仍显不足,说白了还是当下社会变革缺乏彻底性与全面性,未能从根本上颠覆殖民主义及父权制所构建的体系。这一现象也能说明,在后殖民语境下,女性争取解放与平等的历程充满了艰难,也就是说,当民族独立仅停留在政治层面,未触及经济结构与性别文化的深层改造,被殖民者尤其是被殖民女性的解放那也只不过是旧制度的地基上搭建出并不稳定的框架便是了。

4 结语

回头看来,阿莎与阿菲娅的命运,其实共同表明了《来世》中后殖民女性生存的双重悖论,说到底就体现在个体抵抗始终在于制度性暴力的巨影之下。^[7]阿莎的死亡是交叉性压迫的必然结果,殖民经济与父权制度的合谋将她构建。她的身体成为两种体系交易的筹码,其一便是父亲为偿还殖民债务将她嫁入哈里发家族,而另一方面父权家庭则强迫她冒险生育以延续血。但是当产后感染急需药物治疗时,殖民医疗体系与父权家庭又不关心了,这个漠视直接导致她的死亡。而且更可悲的是,她的付出从未被真正承认过,这就掩盖了系统性暴力的真相。继续看阿菲娅,她看似成功的抗争同样暴露了殖民暴力的延续性,但说到底这些成就仍然无法阻断殖民创伤的代际传递,古尔纳正是想用这些来说明,殖民暴力已渗透进家庭神经。另外,阿菲娅为子命名“伊利亚斯”本为纪念被殖民军强征失踪的兄长,打算以文化抵抗对抗历史抹除,却没想到到名字成了创伤载体。她的缝纫收入大部分用于支付丈夫医药费与儿子的出国费,所谓“经济独立”其实都用上承担殖民战争的社会成本里了。

小说标题“来世”本身就是一种隐喻,或者说甚至是种反讽,那就是在殖民者描绘的“文明未来”图景里,非洲女性本应是等着被“拯救”的落后存在,但古尔纳笔下

的“来世”,不过是殖民压迫和父权控制换了身衣服继续作威作福。光换一面国旗、赶跑殖民者根本就不算什么解放,要是骨子里还觉得“西方就是文明,本土就是落后”,要是女性还在传统封建性别观念和旧规矩的夹缝里讨生活,那说白了所谓的“新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那些被历史书一笔带过的女性遭遇,其实说来说去仍然是重复的事。只有真的把这件事摆到了台前大家共同努力,才是检验一个社会是不是真的变了尺子,否则只是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而已。

参考文献:

- [1] 朱振武,田金梅.殖民语境下的逃离和坚守——诺奖作家古尔纳的近作《今世来生》探析[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3(2):29-35.DOI:10.15883/j.13-1277/c.20220202907.
- [2] 黄晖.“古尔纳《来世》中的身份建构与情感共同体追寻.”英语研究,01(2024):168-177.
- [3] 韩伟,任智峰.后殖民·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古尔纳小说的三个面向[J].外语教学,2022(3):106-112.
- [4]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来世[M].李和庆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
- [5] 石嵩.“‘离别’非洲:微缩后的殖民创伤复现.”英语研究,01(2025):43-53.
- [6] 阿玛蒂亚·森,飞扬.“阿玛蒂亚·森评《白人的负担》.”国外理论动态,08(2006):65.
- [7] 余静远.“‘这片土地在人类成就史上无足轻重’——论古尔纳新作《来世》中的历史书写.”外国文学动态研究,02(2022):18-29.

作者简介:兰超强(2002.04.02),男,汉族,安徽阜阳,硕士,中国矿业大学,研究方向:外国语言文学。